

文化書評

賴品超、李景雄編。《儒耶對話新里程》。香港：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，2001。x + 388 頁。

Lai Pan-chiu and Peter K.H. Lee, eds. *A New Stage in the Christian-Confucian Dialogue*. Hong Kong: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, Chung Chi College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 x + 388pp.

不論是在宗教對話或是中國本色神學的範疇，基督教與儒家的對話(所謂「耶儒對話」)都肯定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從中國教會歷史的發展來看，早在明清之際，耶穌會士及一些從儒入耶的中國信徒，便開始反省與儒家思想的適應問題，及至晚清以降，不少來自西方的新教傳教士及中國本土儒者基督徒(Confucian Christian)亦致力於有關的整合工作。不過，進入二十世紀，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關係，在某程度上顯然有「降溫」的傾向。筆者以為，這可從兩方面理解：

第一，這與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命運有關。正如許多研究儒學的學者(如余英時)指出，儒家在二十世紀已不復其昔日的「正統」地位。帝制崩解後，儒家思想失去其制度化的依托，且受到西方思潮的衝擊，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裡。如果我們承認本色神學或耶儒對話背後的目標是「宣教」的話，那麼，基督教在十九世紀反省其與儒家思想的關係，肯定有其價值與意義。但隨著儒學業主流正統角色不再，這種以耶儒對話為主的本色神學模式，也相應失去其逼切性了。三十年代的吳雷川、趙紫宸及八十年代的吳利明，均不違言指出基督教不應再視儒學為建構本色化的唯一對象。

第二，除了儒學自身命運這個宏觀的因素外，耶儒對話式的本色神學模式，也要面對其內在的理論窮途。從基督教的角度出發，二十世紀以前，所謂的「合儒」與「補儒」進路是耶儒對話的主流，這種以儒學經典來詮釋基督教的方法(或稱「國學」模式)，在獨特的時空脈絡下，肯定有其時代意義，但是卻難以突破理論的困局。一方面，有關基督教與儒家的異同比較(主要集中在倫理層面)，多年來重重複複，予人千篇一律之感。這也許亦說明了舊有典範的失效。趙紫宸在三十年代便指出，光從倫理層面指陳基督教與儒家的共同

點（求同），最終的結局就是把基督教與儒家的異質性淡化（去異），耶穌的人格與孔子的人格同樣偉大，那基督教的獨特性是甚麼呢？另一方面，設若有人勇於突破，試圖超越倫理層面的會通，轉而從啟示的角度切入，則又會出現兩面不討好的困局。來自基督教的聲音會質疑，這種近似多元主義或兼容主義的神學立場，是否扭曲了正統信仰；來自儒家（主要是當代新儒家）的聲音又會斥駁基督徒對儒學道統的扭曲，反過來要求基督教接受其命題。歸根結柢，基督教與新儒家（當代儒學的代言人）均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特性。如何在維護自身異質性的大前提下從事耶儒對話，又避免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局？這誠然是不少參與對話者不能迴避的課題。

交代了上述背景後，我們便來到更具體的課題，就是持續了十多年的耶儒對話研討會。首屆的研討會於1988年召開，迄今（2001年）已舉行了五屆。其中第四屆（於1998年召開）的會議主題是「二十一世紀的人性與文明」，論文集剛於今年以《儒耶對話新里程》為題出版。

論文集包括六部分，分別是文明前景、自然生態、人性對觀、人與社群、天人之際及對話會通。綜觀全書，我們可見所謂的「新里程」，主要是在承認基督教與儒家各自的傳統與特性的前提下，分別從基督教及儒家的角度來闡釋當前人類文明（倫理）共同關心的議題。我們可以說，耶儒對話的重心，已經與昔日建構本色神學的論述脫軌。換言之，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，對話的目的已不再具有宣教關懷，而成為單純的對話。正如筆者在上文指出，這種以宣教為出發點的本色化神學，在處理耶儒關係時，已達窮途，是故現時揚棄宣教關懷，而定位於對話與溝通，謀求人類文明及倫理的和諧，相信正是可行之出路。

在當前人類正面對宗教及文明衝突的威脅之際，這種以建構人類共同倫理的關懷，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，肯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基督教與儒家，在共同倫理的範疇內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溝通。當然，基督教學者亦得吸取歷史的教訓，切忌把基督教信仰約化為道德倫理，而應致力闡發基督教倫理，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。

邢福增
建道神學院